

我从教治学的经历和感悟

强海燕

到70多岁的年龄，回忆往事时，总是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概括起来就是这几个词：学生、老师、教学、研究，串起来成为人生奋斗的重心。

一、进入教师职业的坎坷

（一）对中小学教师的记忆

我出生于1950年，1958年开始上小学。我对小学生活的记忆不太多，只记得上的是西安保育小学，住校，其中三年是在自然灾害中度过的，吃饭时每十人一桌，有桌长负责，几乎每顿都喝的是玉米面糊糊加蔓菁（类似于白萝卜一样的东西），桌长要求每人把自己碗里的吃完，而且还要舔干净。我们当时牢记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粮食来之不易啊！桌长的要求就是老师的要求。

还记得，我们班的班主任非常好，只要我们白天遵守纪律好好上课，晚自习时就给我们讲一段《红岩》的故事，我们为了听故事，白天上课时都努力表现好。不知不觉地，一学年过去了，我们听完了《红岩》的故事，我们喜欢小萝卜头，对江姐等革命烈士非常崇敬，憎恨国民党反动派，仇视叛徒甫志高。我们还喜欢高尔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每个同学都读过，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1963年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离家最近的西安六中，这是一所重点中学，我上的是初中、高中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在1000多名考生中，只录取了80人，分为两个班，按分数均衡地分班，我是被录取的第二名，因此学号就是乙班1号。

在中学阶段有两件事值得提及。一是学业喜好，二是青春叛逆。

我喜欢数理化。我喜欢上数学课，也喜欢数学老师，虽然他不苟言笑，但每次上课只讲10多分钟，非常简洁清晰，其余20多分钟让我们写作业，老师在必要时进行辅导，我们通常在课堂上就把家庭作业完成了。我时常有独到的解题思路，受到老师的夸奖。我对理科具有好奇心，自己制作半导体收音机，似懂非懂地看有关飞机制造的读物，中学时就有了长大要当科学家的梦想，想在实验室做实验，为以后从事实证研究打下了朦胧的基础。我心中的伟大理想就是上大学。

喜欢理工科的我，却一辈子从事了文科教学研究。渐渐地，数学细胞开始萎缩，已经没有什么数学天赋了，唯一留给我的是思维比较清晰，逻辑性比较强。

我不喜欢语文课和俄语课。俄语老师人很好，是翻译官出身。但是学习外语要背单词，背语法规则，我实在不喜欢背诵，更不喜欢死记硬背地学外语，又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学外语，因

作者简介：强海燕，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比较教育研究所荣休教授（广州 510000）。

此俄语成绩日渐下滑。每次早自习，俄语老师都来教室辅导，对每位同学都很和气，很有耐心。

但语文老师就不一样了，我的青春叛逆期的行为主要体现在与这位老师的交往中。我不喜欢语文，除了有大量的背诵，这位老师确实让人心里很烦。他师范大学刚毕业，春风得意，上课前总是涂脂抹粉。一次在要求写人物的作文里，我就如实地描绘了他：“一双小眼睛夹着一个大鼻子，一进教室，一股浓香粉味迎面扑来……”好像全班同学都看到了这篇作文，都在窃窃私语地议论着，我心里有些怕，不知语文老师会怎样惩罚我。结果他果然放学时跟我单独谈话，说以后写作文不要写真实人物，不是丑化了就是美化了。但是，惩罚远没有这么简单。一次语文课上，他点名让我背课文，发现我不会，他大声说：“零分。”并记在平时成绩里。以后每次上课，他都要点名让我背诵，我习惯性地起立并沉默，听他大声说完“零分”之后就坐下，同学们每每看到这个场面都在笑。我一共得了十多个零分，直到老师发现没有作用、自己放弃了这种惩罚为止。我心想，我才不怕零分呢，只要你敢写在成绩册上。期末发成绩册时，我果然看到老师惩罚之心不死，写上了一个零分，但是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我父母那时都很忙，没有人注意我的学习成绩。此外，这位语文老师“奖惩分明”，对几位学习不太好的班干部额外补课、开小灶，我和其他同学愤愤不平，采取“偷袭”措施，悄悄地到老师的房间外，朝他的门上、窗户上扔石子后立即跑掉。老师听到声音后，站在门口喊：“谁在捣乱？”我们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这次他抓不到把柄，没法采取惩罚措施。

在我成人后，特别是当了老师，学习了教育学后，理解了这位师范生小伙子刚毕业、走向教师岗位的状况，他还很缺乏工作经验。而叛逆期的学生，在看不惯，甚至被羞辱时，也未能采取合适的方式去应对。

（二）如何成为小学教师

1968年中学毕业后，我们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成了有知识的农民。我每每有这样的感觉：“难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修地球了吗？”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应该还有机会。我在下农村的第一天就从我喜欢的数学开始，每天完成地里的农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自学，弥补由于“文革”耽误的高中学业，一直坚持到离开农村。由于我是高中毕业生，村里小学有老师请产假，需要有临时教师代课，我被选中了。但是那几个月的日子真难熬呀，二年级的小学生很不听话，教室里乱哄哄的，没有办法组织课堂，根本没法上课。我觉得当老师这活儿，气死人，坚决不能干。

下乡两年后，终于机会来了。但是，第一个机会是“中学教师”，我不愿也不敢报名，宁愿再“修地球”一阵子。过了一段时间，宝鸡铁路分局普集镇车务段招工，工种是道岔工和装卸工，我很欣喜，那个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是社会主流，我暂时忘掉了当科学家的理想，觉得在火车站的货场开吊车多么神气。于是我报名了，经过一系列筛选程序，被录取，很激动。在这批新铁路工人培训结束的会上，段领导宣布了具体分工即调令，要求服从分配，铁路系统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调令宣布到最后，是4名具有高中毕业文凭的女生作为知识分子被分配到段属铁路小学当老师，其中之一是我。可真吓坏我了，顿时觉得山崩海裂，一股泪水涌出，不知所措。当时我父亲是下放干部，在岐山县县城，离我们当时培训的地点蔡家坡有几十公里，他夜里梦见我出事了，连忙乘长途汽车赶来安慰我。在我万般痛苦之后，恢复了理性，决定“上蹿下跳”，先找段领导述说我不愿意当教师的理由，争取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的理由是：我没有当老师的能力，不善言辞，而当老师全靠嘴皮子的功夫。接待我的是段党委委员、段团委书记，她之后给段主管领导说，强海燕脑子很清楚，表达有条理，具有当老师的潜力。段党委还是强调军令如山，分配方案不能改变。我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我很沮丧。但是，小学总校校长很有智慧，说：“你不愿意当老师，没关系，先做点儿别的事，你字写得好，先帮忙给中心校办教育简报吧。”后来车务段成立了文艺演出队，根据我的

乐器特长，邀我加入。就这样，我混了一个学期。第二学期开始，我就不愿意这样混日子了，因为我骨子里不是混日子的人，决定到虢镇铁路小学报到上班。

一到学校，校长就给我分了一个全校纪律最乱、学习最差的班当班主任，是四年级。我没有埋怨，一步一个脚印地治理这个班集体。其间，从我的一个在陕西师范大学（以下简称“陕西师大”）读书的老乡那里借了一本教育学的书，如获珍宝，从中学习教育教学的规律和方法，同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耐心给学生补课。大约一个学期的时间，这个班级就转变成全校最优秀的班集体了，学习成绩、运动会、文艺表演样样拿全校第一。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这所学校，我入党了，被评为宝鸡铁路分局、西安铁路局的先进个人，被邀请外出作报告，介绍我的教育教学业绩。从教三年后，我被提拔为教导主任，之后被调到一所新建的铁路小学担任校领导，又被借调到段机关当教育干事，负责该车务段管辖的六所小学的工作。

虽然我工作干得不错，仍觉得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上大学的梦还在做。终于机会来了，“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宝鸡铁路分局有一个西北大学中文系的招生指标，我报了名，参加了考试，成绩第一，觉得一定稳拿，因此胸有成竹地在西安拜访了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我心想，你当年总是那么不待见我，认为我是语文零分差生。但我现在也是老师了，而且还是优秀教师，马上就要到大学学习中文专业了。可是，等我回到虢镇，等呀等，怎么通知书还没有收到呢？快开学了，我有些焦急，经过打听才发现，我落榜了！原因是大学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可我是“臭老九”（知识分子），没有资格上大学。结果，录取了一名炊事员。天哪，岂有此理！我顿时觉得天昏地暗，上大学的美梦破灭了。从此，我就不再做大学梦了。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弟弟被录取到陕西师大中文系，我那年在生孩子，没有想到高考与我有关。第二年，我无意中看到报纸上的高考招生信息，发现已婚、年龄在35岁之下都在招生范围之内。我今年28岁了，完全符合条件，这又唤醒了我的大学梦，心想这回一定要争取当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当时离高考只有40天的时间，我什么资料都没有，我母亲得知后非常支持，她那时是西安中学的行政人员，很快给我寄来了一套复习资料，我如获珍宝，立即开始复习。我想报考理工科，但缺的内容来不及学，只能报文科。招生简章规定，从事教育工作的只能报师范院校。于是我在单位开了证明，去武功县招生办报名，招生办接待我的是欧阳仑老师，他非常热情，欢迎我报考陕西师大教育系，并说他和李殿凤老师很快要回到那里，参与教育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我很激动，心想如果能考上的话，这位招生办的人就是我的大学老师了。这次复习考试，我悄悄地进行，一点声没有声张，主要是吸取上次的教训，一是害怕考不上，二是担心考上了单位不放人。实际上，这次我是自信满满，相信高考是根据成绩来录取的，文科生最怕数学，庆幸自己在当知青时就自学了“文革”时耽误的数学课程。终于，这次按时收到录取通知书，1978年9月开始就要成为梦寐以求的大学生了，我激动万分。同时，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这八年的小学教育经历让自己成长了、收获了，今后一定要为普天下的具有“蜡烛精神”的小学教师做些有意义的事。

（三）跨文化、跨国界的高校学生与教师

1. 中国的陕西师大

初到陕西师大，我被校园里的一切惊呆了，“辽阔”而美丽的校园，古老而有韵味的图书馆，几天中甚至走不出校园，分不清东南西北。从高中毕业到上大学就苦苦地等了十年，我决心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大学的机会。

我所在的陕西师大教育系，就是这年才刚刚恢复重建，曾被安置在全国各地各个岗位上的原教育系的老师们，正在陆陆续续被召唤返回陕西师大教育系参与恢复重建工作，重新开始大学的教学、

科研工作。老师们个个意气风发，似乎找回了当年的青春。老师们见到我们这群 30 岁左右、具有一定教育工作经验的第一届新生，格外亲切，仿佛看到了教育改革的春天。由于教育系是刚刚开始恢复重建，我们这届大龄学生只能读专科，我们都非常刻苦，力争两年内能够学到足够的教育学知识，并与自己的教育实践相结合进行反思。我在这两年中从来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一本小说。工作日住在学生宿舍，周末才回家，照顾孩子，好似在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内心非常充实。

到毕业季，我们班有三名同学根据学业成绩和综合表现被推荐留校，我是其中之一，我喜出望外。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在大学工作。当时刚刚恢复高考，优秀的本科生可以留校工作，但专科生纯属例外，是学校为了扶持我们这个恢复重建的系所作的努力。我们三人都被安排在教育史教研室，因为教育史的老教授们的确年龄太大了，平均 60 岁。我的使命是接班外国教育史的教学科研工作，要在两年后达到从事本科教学的水平，任重而道远。而且这个专业要求“喝洋墨水”，我上大学时才学了两年公共课英语，水平确实有限，留校不久，系里安排我脱产一年半，全职参加师大教师的英语培训班，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英语班被称作“出国英语培训班”，由学校各系选派的中青年教师组成，先后由美籍华人教授和外语学院教授上课。有关校领导亲自到课堂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外语，争取被选派到陕西师大的美国姊妹校或其他外国高校去深造。没想到我也融入国家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虽然我是第一次听说“出国”两个字，从来没敢想过，28 岁才开始学英语，当时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二册的水平，英语底子确实非常差，但是不愿意辜负学校的期望和系领导的厚爱，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赢得这个挑战。

让我感到特别丢人的是，进入出国英语班时，摸底考试我的英语成绩是 24 分。更丢人的是，当外教问我“Do you like a cup of tea”时，我居然听不懂，无法回答。

为了让自己的英语能够尽快跟上进度，不再这么丢人，我与班里个别同学商定了特别自学方案：自学《新概念英语》第二册，工作日每天背诵并默写一篇课文，每天背 100 个生词并默写，牢记心理学的艾宾浩斯遗忘原理，周末进行全周内容的复习。那时，我的儿子上师大幼儿园，他爸爸在南开大学读研究生，每天我接送儿子，照顾他入睡起床。儿子抱怨说，妈妈每天只给他说两句话，早上是“赶快起床”，晚上是“快点睡觉”。他入睡了，我才可以进行自学。回想起来，那时我的确很累，累得浑身的细胞都疼。

在英语班学习一年半之后，我的努力见到了明显效果，成绩跨越式地进步到班里的前两名。1982 年春季学期结束之前，校人事处师资科通知我们班三位老师 9 月份赴美留学，读研究生。这个喜讯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马上就要到美国读研究生了，又像梦一样，人生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到来了，我格外欣喜。

2. 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立大学

去美国之前，我还没有坐过飞机呢。太多的新鲜事要遇见，我在飞机上就拍了许多云彩的照片。当飞机即将降落纽约机场时，地面上灯火通明，高楼大厦林立，小轿车奔驰在各条宽敞的道路上，一派繁华景象。在纽约，我确实感受到“文化震惊”，以至于几天来根本说不出一句英语来。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接待我们住宿三天之后，我们就要自行奔赴目的地。

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以下简称马大）阿姆斯特校区位于波士顿附近，从纽约要乘坐长途大巴前往。到达阿姆斯特小镇的大巴车站，陕西师大的前期留学生来接我们，安排好了住宿，买了必需品，请我们吃了饭，交代了注意事项，就离开了。美国的生活节奏快，各忙各的，后面的事情全靠自己了。第二天，我独自在校园里行走，寻找我将入学的教育学院，秘书接待了我，她说话语速特别快，

我基本听不懂，只听懂了“你的导师今天不在办公室，请你明天下午来见他”这句。

第一学期的学习非常不适应，一是选课制，自己随便选，不知所措；二是学习内容与国内的很不一样，国内所学的教育学知识在这里迁移不了；三是所学英语跟不上，第一学期基本听不懂。但是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

关于课程学习的问题，我采取的对策是，面对 100 多门选修课程，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和目标是什么。第一，通过硕士学习，要胜任在陕西师大的外国教育史教学工作。关于外国教育史，老师推荐了若干名著供我研读，并送给我这些名著，让我带回中国，供教学研究使用。其中，我重点学习了美国教育史课程。教育史是通过独立学习课程进行的，老师与学生一对一进行提问、讲授和指导。

第二，深入钻研美国基础教育。我当过八年小学教师，了解中国的基础教育，在美国首先要把握美国基础教育搞清楚。为此我选修了美国基础教育课程，还旁听了本科生的教育学课程。为深度了解美国课堂的教与学，我还旁听了一名中学老师一学期的历史课。此外，还通过访谈、课堂观察和收集学校文本资料，调研了 20 多所不同类型的中小学，如蒙台梭利学校、无年级学校、无墙学校、磁石学校、农村学校等，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我惊讶的是，原来学校的课堂可以是这样的。这使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与学。这些对美国基础教育实践的考察与研究生课程，都帮助我深度了解了西方文化中的教育。回国后，我作为第一作者的处女作《今日美国中小学》问世了，其中有一章就是我访问美国学校时记录教育实况的彩色照片及解说，非常生动，至今看来，仍觉得很有新意，是宝贵的研究资料。但是，美国基础教育真是这么完美吗？我从文献资料里看到吸毒、少年犯罪及少女怀孕仍是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严重问题，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平，因此我又修了一门关于教育法及少年犯罪问题的课程，并期待能到美国的贫民窟里看一看，特别是看那里的学校，但是没有人带我去。《今日美国中小学》中有一章反映了我在这方面的文献研究。

第三，我还选修了国际教育课程，专门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听课学生基本都来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对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美国同学。在这门课里，我讲解了中国教育的发展阶段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教育的春天，有一名美国同学非常热爱中国，她主动和我一组一起研究中国教育，并为我的发言做助手，组织大家研讨。这位美国同学后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教育传媒专业的教授，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在国际教育课程中，我还了解到非正规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这个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深受启发，看到了教育不仅有正规教育，还有非正规教育和不正规教育（informal education）。毕业回国后，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浅谈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教育》。

第四，当时的美国是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在教育评价测量及统计学方面都很先进，我选修了这方面的三门课程及计算机编程。这些课程还能利用上我的数学基础。教育评价与测量的教授非常欣赏我的作业，他希望我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婉言谢绝了，因为我学完必须回到中国，那里那么需要我，不能辜负单位的期望。

第五，我还选修了大学教学法课程，为了胜任回国后的大学教学工作。我发现在美国的课堂上，无论是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课堂，美国学生习惯随时通过提问打断老师的讲授，他们总是有许多问题要问，老师也非常习惯并欣赏学生的提问，随时暂停讲授内容，认真回答学生的提问。项目式学习、模拟情境教学、角色扮演、头脑风暴等，都是经常采用的课堂教学活动，这背后的教育教学理念值得探讨。这些对我日后的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的教学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国的教师对学生也非常热情，师生之间都以名字称呼，像朋友一样。但学生时不时对老师也

进行反抗。例如，老师考试出题太难了，大学生就给老师的讲桌上摆上大石头，以示抗议。又如，中学生在有人听课的情况下，不想学习当堂内容，就与老师高声辩解。而我的美国同学对我都很友善，尽力为我想要做的事情提供帮助，实地调研的 20 多所中小学都是我的美国同学分别带我去的，非常感谢他们。

关于语言问题，我自认为没有语言天赋，记忆力又不好，不喜欢需要记诵的语文、外语学科。但是命运逼迫我“喝洋墨水”，在陕西师大英语培训班里，使尽浑身解数去高速度记诵外语，虽然取得了飞速的进展，但现在回想起来，也只是在语言知识上下功夫，未能转换到语言能力上。在美国留学的实践，使我完成了从语言知识到语言能力的转换。

在专业学习之外，我充分利用时间融入美国社会生活，不在中国人圈里扎堆。马大国际处提供许多活动帮助中国留学生。例如，给中国留学生推荐了一对一互帮互学的美国学生，我和喜欢中文的美国学生马美涵每周见面一次，她教我英文，我教她中文，坚持了两年。又如，给每个中国留学生推荐了友好家庭，我经常到我的美国友好家庭做客，参与家庭远足活动。此外，马大国际处还组织我们中国留学生去纽约的博物馆参观，去波士顿、华盛顿、费城旅游，参加有关会议，接触许多当地人。我自己也安排了一些活动，如与一位美国同学一起做手镯，她也付我工钱，做好后她拿到学生中心去卖，成为她勤工俭学的收入，我俩在做手镯中，聊天聊得很深入，涉及方方面面。我还去农场体验生活，学习摘草莓，与农场主聊天，与农场工人攀谈。我在这些真实情境的人际互动中，从不同侧面了解了美国的社会文化与生活，不知不觉地发展了语言能力，似乎发现这才是学习外语的好办法。

课程学习中的语言问题是另外一个难点。第一学期上课基本听不懂时怎么办？我课前认真预习，课后抓紧复习，甚至上课时用录音机，还借用老师的教案，能想的办法都想了。有一个美国同学发现了我的语言困难，每次上课，她主动给我提供帮助，下课后，她给我把当堂的学习内容提纲挈领地再讲述一遍，我清楚多了。麻烦她这么多次，我不好意思，她说没事，并说她能拿到“助人为乐”的学分。为了更多地学到相关知识，我选择了以课程学习完成硕士学位学习，代替学位论文，除了必须完成的学分量，我多修了好几门课。在这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学习中，真不巧，没有遇到一个中国同学，完全浸泡在英语环境中，学科学习中许多专业术语生词如何理解，全靠看课本，根据上下文推断出。我带了英汉词典到美国，但是根本没有时间查。真可谓在正在学习的新语言中学习新知识，对新知识的渴求与好奇，驱动了语言能力的发展。专业表达即学术语言务必通过专业的过程来获得。我深深体会到，语言是在使用中发展的。在美国的两年中，我的母语书写仅有给家里写信时才使用，惊人地发现，我居然忘掉了许多字的笔画而写不出来了。语言的用与不用，能够造成天壤之别。

二、站好大学讲台：在教中学、在学中教

（一）教学初始

美国教学法老师问：“你回国后会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法？”我回答说：“不会和美国的一样，也不会与中国传统的一样。”究竟是什么样，当时也说不清。

1984 年 8 月，我留学归国，回到了西安，回到了陕西师大。虽然我在美国仅待了短短两年时间，回国后也遇到了文化变迁的不适应。例如，老远见到自己的老领导，就想高喊：“安民，你好！永明，你好！”但立刻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不是美国。我第一天给 81 级本科生上课，刚走向讲台，就迎来了全班同学的大笑，我莫名其妙，后来才得知是我留的长发、穿的牛仔裤不合时宜。留长发

是因为在美国进理发店很贵，牛仔裤是一年四季都这样穿的。但是不用解释，剪了、换了就行了。还有好心的老师，教我怎么对付学生：“如果学生迟到了，不能原谅，让他站在门口。”我听后，谢谢他，但没有照做。

果然有学生迟到，我一挥手请入座。上课时学生可以坐着发言，不必站立。课间是我主动擦黑板，后来都是学生抢着擦了。我用鼓励的方式催促学生交作业，鼓励学生提问。

我是陕西师大教育系第一位出国留学的教师，且持续好些年是唯一的，那时的硕士毕业生也是凤毛麟角，所以我的老师和学生都对我的教学抱有别样的期待。欧阳仑老师有一句名言是针对新教师说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意思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牌子，归根结底要看你的教学怎么样。我这个被教育系恢复重建后精心栽培的“新马”该好好在教学上有所建树了。1984年秋季，我正式开始大学教学工作。

我刚从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研究生毕业回陕西师大时，信心满满地做好了“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准备。但当时师范院校教育系都被要求适应教育的“三个面向”，开设“比较教育学”这门新的专业课，有条件的院系要开设比较教育研究生专业。因此，当时系里分给我的教学工作就是教“比较教育学”，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学科，就靠王承绪、朱勃、顾明远共同主编的《比较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这本书和我在美国的经历来教学。在教学中，我的“拿手好戏”——美国基础教育实地考察幻灯片，很受学生欢迎。

（二）教学的设计

1. 专业课教学

我的教学采用多种能激发学生思考的教学活动。最常采用的是模拟情境角色扮演，学生能激动好几天。例如，在比较教育课堂上，所设计的模拟情境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发展中国家分配教育援助经费的会议现场。需要的角色有国际组织教育官员及教育专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部长或司长。学生们非常积极主动，根据自己的角色收集资料，准备发言和争论。例如，给坦桑尼亚多少教育援助，援助小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还是成人扫盲，其他需要援助的国家怎么办，学生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教育有所了解、有所思考，然后才能以专家身份发言。事先我也提醒学生，一定要进入自己的角色中去，作为专家发言之后要说“谢谢”，反驳不同意见时，要认可不同意见的价值，进一步阐述自己观点的论据。课堂气氛非常热烈，“不同国家的官员和专家们”发言都很精彩，铿锵有力，对作为会议“观察员”的我来说，也非常震撼，深受启发，切实感受到“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那天专程来听课的学校教学督导组高度评价了这节课。20世纪90年代，我在宁夏时见到了毕业将近十年的学生，他很高兴地说：“强老师好！我们毕业了这么多年，还记得你给我们上的课，很生动啊！”我随即问：“还记得什么内容吗？”他说：“深刻地记得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模拟会议，我的角色是专家。我们可忙碌了，几乎一个星期都深陷在自己的角色里出不来呢！”从这些教学实践中，我悟到，讲授不是唯一的教学法，有可能是最低效的教学方法。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要设计好能使学生主动学习、乐于钻研、善于思考的教学活动。现在看来，模拟情境教学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在20世纪80年代时却是教学创举。

后来在讲教育学硕士的“西方教育管理模式”课程中，我最常用的角色扮演教学是将学生分组，每组学生中的角色有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讨论的是学校工作中具有争议的重要问题：如何对待体罚，师生关系，家长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等，每组讨论的结果在全班展示，共同评价该组的决策过程模式是民主的还是科学的，每种决策模式有什么长处和缺陷。这个教学活动可以让学生深入探讨所学理论，从教育管理实践中分析、发现不同理论的长处与跨文化适用性。

2. 英语类课程教学

在陕西师大教育系讲授“比较教育学”一年后,我开始开设专业英语选修课,课时一学年,全英文授课。那时,我是教育系唯一的“英语专家”,虽然自己是非英语专业水平,但被派上了大用场,凡是陕西师大接待的外国教育学者,都是我做讲座口译,凡是有对外联络的事宜,都是我写英语信件,用英语做方案。我似乎觉得我的英语水平比在美国时更溜了。

在专业英语课上,我使用了周南照先生编的教育专业英语文献,在每个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分类下选择了能反映教育未来发展趋势的代表性文章,让学生进行泛读,逐渐积累专业术语及其表达。专业英语词汇的积累非常关键,我自己出国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吃了大亏,以致留学第一学期基本听不懂课。这个积累要靠大量地阅读教育专业英语文献,全英文教学,利用好聆听外国专家的讲座及其交流研讨等机会。

我还给学生讲了学习外语的捷径和秘诀。我认为,学习外语就像爬滑滑梯,不论可以爬到多高,都会溜下来,除非爬到滑梯顶上,就溜不下来了。学习外语无论多么努力,学了多么多,终究都会忘记的,唯有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使用外语,才不会遗忘。交际性英语教学理念强调,学英语就是“做英语”“用英语”,这就是捷径。

所谓秘诀就是“自信心、重复、脸皮厚”。首先,外语学习者要始终具有“自信心”,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专业英语选修课学生,一开始都信心满满的,但是学了一半时间,到了高原期,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不好,不适合学英语,这是没有自信心,不是记忆力问题。其次,学外语贵在重复,即在不同的语篇或情境中见到或用到。重复多了,自然就会了,不用记忆。不常用的词,不用担心记不住,用途不大,忘了就忘了。要提高听力、口语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就要不断地进行“听说读写”练习,最好在真实语境中进行,这就是重复。“脸皮厚”指对不确切的表达敢于尝试,上课要勇于发言,不怕出错,和外国人交流时一样。记得我在甘肃做项目时,与英国专家一起吃饭,看到盘子里还有一些菜时,想问他是否能再吃些,忘记了要用“room”这个词,就试着问:“Martin, do you have enough space for the dish?”他回复说:“Yes, I do have enough space for the dish.”交流成功了,我很高兴。看来还是要敢于尝试,不怕出现语言错误。

在科技、教育与人类生活这块内容的专业英语学习中,我增加了一篇短文阅读,其内容大致是,受战争或资源影响,人类在陆地上不能生存了,但有两选择,一是去海底生活,二是去金星生活。在海底就要像鱼一样,除了住在潜艇里,还要像潜水员那样游在鱼群中;去金星生活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每个月会有半个月是黑夜,半个月是白天。阅读后请大家考虑,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么巨大的变迁该怎么办。每个同学都陷入了深思,有些同学想去海洋生活,有些想去金星。大家都为生存问题议论起来,忘掉了是在学英语。其中一个女生眨巴眨巴眼睛,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她用英语回答说:“在金星是黑夜的半个月中,我去地球的海洋里生活,在金星是白天的半个月里,我去金星生活。”这个思路太有创意了!她是李闻戈同学,现在是广东省知名的特殊教育专家。学生聚焦在感兴趣的学习内容上,面对具有挑战性的议题,往往能够集中精力思考,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语言学习任务。

绝大部分选修专业英语的同学,都能牢记外语学习的捷径和秘诀,顺利完成了高难度的学习,甚至有些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李延平同学学完专业英语课后,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成绩是全校第一名。她现在是陕西师大比较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李曼丽同学除本科阶段认真学好专业英语课外,在比较教育学硕士课程学习中,分别精读和泛读了若干本英文版教育名著,对其观点进行思考,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读书笔记,硕士毕业后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汪永铨先生的博士生,成为闭门弟子。她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工作,现为教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我自己也在教育专业英语的教学中不断积累,若干年后出版了高等院校教材《教育英语时文导读》,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教育学科的英语学术语言,具备阅读和理解该学科英语文献的能力;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国外教育和教育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开拓视野,拓展教育学科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三) 研究生教学:对教与学的探讨

在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教学中,我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与学生共同探讨教与学的议题。在课堂上,我请每名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下列填空,标题是“我是一名学习者”。

1. 当我_____的时候,学习对我来说是愉悦的。
2. 作为学习者,我擅长的学科和技能是_____。
3. 我最喜欢问的是哪类问题_____。
4. 当我_____的时候,我学到的最少。
5. 作为学习者,我希望在_____方面改变自己。
6. 我最近学到的新东西是_____。

填完后,请学生在小组中分享自己的答案,注意自己与别的同学的答案的相似与不同,然后全班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填表并与学生分享,从中我才发现,我最喜欢问的问题是 how。对什么时候学得最少,即最无效,学生们给出了多种回答“不感兴趣、乏味无聊”“没有挑战性”“肚子饿了”“没睡好觉、困了”“身体不舒服、病了”。对学生形成的结论和理论阐述,我进行补充。

(四) 机遇、挑战与充电

1. 机遇与挑战

由于教学突出,科研也有长处,仅任讲师职称两年的我,就在陕西师大破格评上副教授,当年全校破格的指标只有几名,经过几轮角逐之后,我入围了,一夜之间,我被称为“女强人”。当时,我觉得这个职称很“伟大”。为了对得起副教授这个职称,我把所教授的每门课都重新备了一遍,使自己上起课来像一名副教授。一年之后,由于教育史专业的教授年事过高,我又被选定为外国教育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以解决青黄不接的燃眉之急,自己当时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真地开启“导师之路”。记得教育史专业张安民教授是陕西省有名的笔杆子,他主动帮我指导前几届硕士生的学位论文,把我“扶上马,送一程”,让我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指导论文。

例如,我给研究生们总结了“论文开题进行曲”。第一步是选什么题,怎样选择问题域:要从自己的工作性质出发或依据个人的长处和兴趣来思考,在教育实践中都发现了哪些问题,在课程学习中发现了什么研究议题。第二步是浏览文献:围绕选题范围广泛浏览文献;做必要的笔记;逐渐缩小范围,发现重点和兴奋点。第三步是文献综述:对已有的研究按研究内容进行分类;对每类文献概述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对被概括了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或研究结论的矛盾、问题、漏洞或空白。第四步是根据对文献的综述和分析提出研究问题。第五步是根据研究问题进行研究设计,包含研究视角、分析框架、收集资料的工具(研究方法)、处理资料的工具等。我特别提醒学生准备开题报告时可能会出现“常见病”:自欺欺人(失去自我)、自相矛盾、画蛇添足、信天游、一团乱麻、没有骨头的肉(没有观点,只有资料)、没有肉的骨头(没有资料,只有观点)。

2. 挑战与充电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要不断充电,根据专业需求,最好继续“喝洋墨水”,机会随之而来。

一次机会是1991年9月至1992年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OISE)的博士课程学习。20世纪90年代初,我作为陕西师大加拿大教育研究中心的首批研究人员,被选派赴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做访问学者。我利用半年访学时间，认真学习了 Ruth Hayhoe 教授讲授的博士生课程“比较教育学”，这是我第一次正规学习这门专业课程，从中领略了许多，知道自己之前只是自学了这门课程，补充了许多缺乏的知识。

我在 OISE 这半年中，还选修了两门教育管理学的博士生课程，其中一门是西方教育管理理论，由此对理论探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各种管理（科学、民主、文化、模糊、政治、主观）模式的比较与分析。又如，教育管理理论的功能是解释、指导和预测，其功能的力度有多大？再如，教育管理理论与教育管理实践的关系是怎样的？西方的教育管理理论与中国教育管理的适切性如何？管理理论能否解释异文化中的管理现实？

这里仅列举科学、民主、文化三个模式做简要分析。我原来以为，科学、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一点儿瑕疵。通过对学校作为组织的性质、管理的过程、领导的形象的分析，发现科学管理模式的价值是：强调管理的科学性、技术操作和程序；努力排除主观因素和情感因素的干扰；致力于寻求管理的普遍规律；有利于克服管理中的主观性、盲目性和经验性。但科学管理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强调等级，忽视参与；强调领导的职、责、权，忽视专业人员；忽视决策过程的非理性因素和复杂性。

民主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组织成员是平等的；组织成员在广泛参与和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决策；组织成员都是决策者和执行者；组织中存在着专业权威；领导是组织中重要而平等的一员。

在学校管理实践中，民主管理的类型有四种：一是相信意见能够统一，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二是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包括校长在内；三是大家充分讨论，校长最后决策；四是形式上的民主。为了理解民主管理模式，我旁听了 OISE 教育管理系教授会的决策过程。系主任是位非常聪明的民主模式的实践者，他提出了决策议题：“为了扩大招生规模、服务社会，我们系是否要招收一线管理实践者攻读学术学位？”绝大多数教授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 OISE 是加拿大最高的教育知名学府，不能降低生源标准，所以这个议题不能通过。这与系主任的想法完全相悖。会后，我单独询问这位系主任：“你的意见和主张不能得到通过，那系主任的作用是什么？”他笑眯眯地说：“你没注意到，我还提出了第二个议题，进行社会调查，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再上会。这个议题大家都通过了。等下次上会，第一个议题肯定就会通过。”

通过进一步研修，我发现科学管理与民主管理的分歧主要是责任与参与的矛盾，职务权威与专业权威的矛盾。对待分歧的积极态度是，在两种模式之间进行调和与妥协，协商管理；消极的态度使民主流于形式。民主模式的局限性是决策过程缓慢、滞重，忽视矛盾与冲突。

而文化模式有其独到之处，它强调共享价值观，认为组织成员的信念和价值观是其行为和态度的基础，必须形成具有学校特征的共享观念、共享规范和行为模式。文化模式认为，有效的组织改革意味着文化的变化，改革失败的原因往往是改革者与执行者的价值观不一样。使组织成员支持学校的工作，不能靠职务权威，要靠文化的形成和认可。

我发现成功的管理实践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管理模式，而是要把不同的管理模式进行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结合。“学校发展计划”（SDP）是将这三者结合的成功典范。SDP 明显反映了科学管理模式在技术、民主管理模式的参与、文化管理模式的共享价值观方面的优势。这门博士课程使我受益匪浅，我回国后开设的“当代西方教育管理研究”的研究生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另一次机会是 1994 年 9 月至 1995 年 2 月参加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博士课程学习。1994 年，我被选派为国家高级访问学者，赴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专门就比较教育理论与方法论方面，采用大量阅读与博士课程学习的方式，进行深造，认真研读各个比较教育理论流派的第一、二手资

料。这激发了我的求知欲，我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状态，半年来也像苦行僧一样，大英博物馆就在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旁边，我一直没有时间进去参观，只是快回国时，匆匆进去看了一眼。Robert Cowen 是我的合作教授，之前在他名下学习的有赵中建、董建红等中国学者。Cowen 是一位非常犀利、有跨文化认知与经验的比较教育学者，对我很有帮助和启发。

当时，我感兴趣的比较教育问题是：审视外国教育的视角有哪些？我们怎样“看”外国的教育？在怎样“看”本国的教育与外国的教育的理论中，我比较欣赏文化相对主义，但是又有些难懂，当时在英国就专门拜访了国际知名的比较教育大师埃德蒙·金，他崇尚文化相对主义，我也邀请了一位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和一位研究生一起参加这个访谈。金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他老人家见到我们彬彬有礼，并帮我这位晚辈女士脱下大衣挂起来，我很感动。然后他就侃侃而谈，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总共两个小时。当时觉得能见到这位大师真荣幸，担心有重要的地方听不懂，就用录音机录了下来，保存至今。

文化相对主义学者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对微观世界的分析，研究参与者对教育事件的理解和看法，认为影响、决策、改革、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参与者与环境的互动等构成了教育现实。他们批评科学主义的实证研究缺乏人们对教育问题的主观解释，不研究教育本身及参与者对教育本身所赋予的含义。

在英国进修的半年，我进一步夯实了从事比较教育教学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回国后，在这方面对我最有启迪的著作就是顾明远、薛理银合著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这些奠定了我成为博士生导师的专业基础。

从事大学教学工作三十多年，我先后任教于陕西师大和华南师大。2000 年作为人才被引进华南师大教科院任教直至退休，主要教授“比较教育学”“专业英语”“当代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小学教育”“小学英语教学法”等课程，多次获得教学优秀奖、优秀导师奖。

三、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合作，在合作中成长

在高校工作一年后，我的教学得到了认可。但是系领导都很操心我的科研工作。他们认为，从美国留学回来没有国内导师引领，没有国内同学互相帮扶，在比较教育圈里怎么能够被认可呢？他们随后采用“扶上马，送一程”的方式，让我进入国内比较教育学术圈。得知 1986 年在武汉要召开我国比较教育年会这个消息，系主任张安民、系副主任杨永明就积极推荐我去参加，吴元训先生在会上逢人就举荐我：“这是强海燕老师，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提交了参会论文，在会上也积极主动，认识了许多同行，并向会务组请求利用晚间时间播放“今日美国中小学考察纪实”幻灯片系列。当时我国从事美国教育研究的多以高等教育为主，从事基础教育研究的学者很少，这个考察纪实的播放吸引了不少与会者，当场就有单位邀请我会后作讲座。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科研特色有两点：一是实证研究，二是国际合作。

（一）实证研究、扎根教育实践

在我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三十余年中，一直青睐实证研究，这可能源于我初中时想长大当科学家、在实验室工作的梦想，也可能与我不擅长写宏大叙事的文章有关。

在研究工作中我注重接地气，关注农村，关注女性，关注民族，大都聚焦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念念不忘小学教师。我几十年来奔波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云南、贵州的乡间小道上，忙碌于农村学校的调研中。

1. 女童教育研究

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女童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揭示和剖析阻碍性

别公平教育的障碍，寻求学校教育促进性别公平的有效途径和方式，确保女童学校教育有质量地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以“女童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研究”为题，我主持申报并获批了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女童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研究》是结题成果，展现了我们的研究理念与方法，汇集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具有突出的实证性，是在扎根学校、进行较大范围的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注重用女性的视角来体验、考察教育问题，让女性的主体声音表达其学校教育经历和经验。我们采用了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关注女童群体学校教育状况，以女童主体声音和话语寻找女童学校教育的发展和需求。注重反映女童作为受教育主体的教育观点，从女童的个体经验中揭示影响女童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的内部关键因素。注重女童的话语权和女童的主体地位。对女童来说，受教育更是一种赋权过程，对女童具有本体价值。在该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满足女童教育需求，促进女童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新的研究议题、实践对策及政策依据。

2. 跨国实证研究举例

作为比较教育学者从事研究，一般都带有跨国的味道。下面是我主持的跨国实证研究的例子。

我在位于陕西师大的教育部西北高校管理研究中心任教的时候，接待了世界银行的专家，他推荐我读 Tony Bush 的《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英文版）一书，说这本书通俗易懂，囊括了当代西方教育管理的各个模式，建议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者要读这本书。当时我国教育界都在改进管理，提出要进行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我读了这本书，觉得对我国当时的管理实践及管理研究很有借鉴价值，打算翻译。可是这位英国教育管理大腕在哪里呢？我如何才能找到他？既不认识，也没有联系方式。我就根据他著作里出版社的地址写信询问 Tony Bush 的单位和联系方式，很快得到了回复。1993 年 9 月，我利用去英国伦敦大学访学的机会，约见 Bush 教授，去了莱斯特大学与他商谈翻译书的意义及具体事宜，他不但同意了，而且希望进一步与我及我的团队合作，打算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他来中国商谈具体合作。Bush 教授非常高效，很快就把这一系列大事办妥了。

我们商谈了从事合作研究的方方面面，包括文化包容、平等、相互尊重等，英方团队赴中 5 人，中方团队赴英 5 人，配对共同去各自负责的中英案例学校调研，共享研究资料，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中英学术刊物上，成果均以中英两名研究者联合署名。我方被遴选的赴英研究者是当时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司晓红、李延平、陈晓端、赵微、刘华。中英合作项目是他们学术成长的一个里程碑，他们现在分别是我国教育管理学、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特殊教育学、学前教育学领域的佼佼者。

双方合作的“中英 14 所学校管理模式的个案研究与比较”课题的研究成果发表在《比较教育研究》等多个中国教育期刊上，也在英国的 *Compare* 上发表。特别是我与 Bush 教授合作的实证研究文章《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英基础教育》发表在《教育研究》2001 年第 10 期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 年第 2 期作了转载。《比较教育研究》2003 年第 1 期发表了顾明远先生在世界比较教育论坛的开幕报告《知识经济时代比较教育的使命》，其中特别提到这个合作项目：“今后我们也应主动走向世界，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我们的论文，这样才能与国外学者对话。最近我看到强海燕教授和英国学者合作，完成了‘中英 14 所学校管理模式的个案研究与比较’的课题，并在 *Compare* 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合作和研究。”

3. 四国基础教育比较研究——以教学的比较为例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我深深体会到，进行比较的目的之一是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的教育现实，比较能克服本民族文化屏障对本国教育形成的固有认知，有助于从更多的维度审视本国的教育。目

的之二是教育借鉴。但是,借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搞清楚什么是值得借鉴的,中国的实际是什么,外国的成功教育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我的著作《中、美、加、英四国基础教育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反映了我二十多年来对这些国家基础教育资料的收集,对具有借鉴价值的外国优秀教育实践与经验的挑选。我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通过观察、访谈及其他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方法,选材尽量具体,注意微观层次、操作层次和学校及课堂的鲜活内容。重点关注课程与教学,进一步进行了跨文化的思考,进行了四国比较分析,探讨改革的发展趋势,探讨教育的借鉴和本土化问题。

(二) 国际合作研究

1. 跨文化理解与双边合作研究

一是与 Tony Bush 教授的合作。Tony Bush 教授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奔着与我及我的团队进行合作研究而来。当时 Bush 教授是个地地道道的西方学者,来到中国经历了一些文化震惊的事。他刚到北京的机场,就很焦虑地对自己说,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东方大国,我只认识强海燕一个人,还要转飞机到另一个城市,万一见不到怎么办呢?到了陕西师大,学院热情地接待了他,用餐时我们发现他不会用筷子,显然他在英国时没有吃过中餐,和他碰巧同在陕西师大访问的英国比较教育学者 Cowen 就跟我私下调侃地说:“这位英国教授连筷子都不会用,还搞什么国际合作研究?”Cowen 在中国文化中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更严重的事发生了,Bush 教授不喝中国的矿泉水,可能担心不干净,要求我的团队成员帮他买英国的或其他进口的矿泉水,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买了。虽然我们心里觉得不舒服:“这位外国专家怎么这么挑剔呢?”更有甚者,过了一天他又开始不吃饭了,我们请了医生给他看病,医生看后说,身体没问题。我心里在想,他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学者,“思想有问题”。但是我只是对他说了医生诊断的情况,让他别紧张,请他好好休息,并告知等他适应后我们开始谈项目。三天后,他着急了,想与我方尽快商谈合作事宜。我们的合作项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谈成的。当时我也没经验,没有想到这位没有去过非西方国家的大学者不习惯中餐,如果及时带他去西餐馆用餐,使他能够较快过渡不是更好吗?这使我想起来自己第一次出国时,吃了一天的西餐,肚子已经受不了了,明显觉得恶心想吐。我非常佩服 Bush 教授,为了谈成项目,能够忍受肠胃疾苦,努力克服文化障碍,当然他也被我方的合作热忱所感动。在三年的合作项目完成之后,他已经成为中西文化兼通的西方学者,活跃在国际教育舞台上。2025年,他去上海时,我和我在陕西师大当年的合作团队与 Bush 教授联系上了,打算邀请他明年来西安故地重游,讲学并访问学校,Bush 教授热情地接受了邀请,我们都念念不忘20多年前的精诚合作。

二是与加拿大 Linda Siegel 教授的合作。Siegel 教授是西方著名的心理语言学家,先后在多伦多大学的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和 UBC 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在项目开始时,我就听说她是一位性格很独特的学者,难打交道。我第一次到她家里吃饭时心里很紧张。但后来,从中加巩固项目开始到英语浸入式教学与课程研究,我和我的团队与她及她的团队一直合作了将近三十年。

1997年6月,中加大学巩固项目“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子项目“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第一期研讨班”在西安召开,Siegel 教授在会上介绍的第二语言浸入式教育模式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可否用这个模式教中国儿童学英语”?我将这个念头分享给 Siegel 和我的中国同事们,得到了大家的共鸣与赞同。于是我们兴奋地行动起来,成立课题组,制订实验方案,联络实验校,培训实验教师。当年9月一开学,英语浸入式教学实验就开始了,它成为这个中加大学巩固项目的意外收获和延伸性课题。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语言、高科技的语言和信息时代的语言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而儿童怎样可以学好外语是一个需要攻克的堡垒,外语浸入式教学

模式以其鲜明的创新性激发我们去挑战传统的英语教学。这也使我想起来自己外语学习的坎坷经历，其经验与教训都在浸入式教学中找到了答案。

三是与 Ruth Hayhoe（中文名许美德）教授的合作。20 世纪 90 年代初，Ruth Hayhoe 教授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一秘，她要到延安考察并中途路过西安，陕西师大李中善副校长接待并促成了学校加拿大教育研究中心的建立，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许美德教授。她用流利的中文在陕西师大作“中国教育史”讲座，震惊全校师生。后来她又回到多伦多大学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她酝酿申请中国教育项目时，许多白人学者都存疑。但她是具有中国情怀的加拿大人，酷爱中国文化，就连结婚照都是穿的中式红色大襟上衣。她当时申请并负责了两项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资助的与中国政府合作的中加大学大型项目，一项是与顾明远先生合作的中加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另一项是中加大学巩固项目“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我是这个项目的中方协调人，负责向教育部国际司汇报工作，收集整理进展资料，与加拿大方面就合作事宜及时沟通。中方项目单位共有六所高校，其中五所是知名师范大学，一所是知名理工大学。六所高校的具体合作领域及项目活动都已事先确定好，各负其责。记得在设计申请项目之前，加方邀请中方高校十余名学者赴多伦多一个月。在这个月，中加学者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流和沟通，逐渐形成跨文化的理解，加拿大学者了解了中国教育的需求。这种沟通是多方面的，包括访问加拿大的学校，分别到将合作的加拿大教授家里用餐等。她想尽办法让加拿大的这些白人学者了解中国文化，例如，在元宵节那天，她召集加方学者开会，并请我用英文介绍元宵节的来历，为此我还准备了几天。这些老外不知道什么是元宵，我就形象地比喻为像乒乓球一样又白又圆的甜品，他们都会心地笑了。Ruth 还请我在 OISE 给教师及研究生作关于中国妇女教育的讲座，我从“妇女能顶半边天”讲到“干得好还是嫁得好”，阐述了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成就与挑战，促使加方学者与学生了解中国。

妇女教育研究强调性别平等与公平，强调女性在教育中的参与。中加合作妇女研究子项目在陕西师大开始之后，校园沸腾了几周时间。我国妇女史研究专家杜芳琴、性别教育研究专家郑新蓉、性别心理学专家王淑兰等积极参与其中。加拿大华人女性研究专家、York 大学熊秉纯教授带来的质性研究让我耳目一新，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也吸引了我。

我在多伦多做访问学者期间，许美德教授申请了 CIDA 的中国高等教育区域考察项目，该项目旨在调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与特色。其中为期一个月的西北地区教育考察，她希望我和她一起前往，时间是 1993 年。我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了。但是，陕西师大教科院方俊明院长担心我俩不行，就给我们配了一位年轻的男教师田建荣，发挥秘书和“保镖”的作用。这好像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我们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访谈法，访谈的对象是西北五省（自治区）教育厅不同部门的处级干部、每省（自治区）三所有代表性的高校的不同部门的处级干部及女教授代表。如何联络上这些被访谈对象，如何使他们愿意接受这个调研，这对我这名刚过 40 岁的普通大学教师来说太难了。后来，我想了办法，通过设在陕西师大的教育部西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来联络，我是该中心的教师。中心负责人很乐意帮忙，但是提出：“中心和你们的调研单位只是协调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可以通过中心的协调信和有关学员进行联系。”这对我很有启发，我联系了我的同学和一些毕业后在宁夏、新疆、青海的高校和教育厅工作的学生，希望得到帮助和支持。这些联系都得到了积极反馈。可是，西北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接到了甘肃省教育厅回复：“除非有教育部的通知，甘肃省一概不接受国外的调研。”这一闷棍打得真猛。甘肃省拒绝了怎么办呢？于是，我给李秉德先生写信，他是德高望重的知名教育学者、西北师大老校长。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他也不认识我，但他与许美德老师很熟。我在给李先生的信里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讲述了我们到甘

肃的调研任务。到了兰州，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李秉德先生亲自带我们去省教育厅会议室，各位处长们都已在那里等候，大家看到陌生的外国人都有些拘束，当发现这个老外专家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时，大家都放松地笑了。随后几天，我们去了西北师大、兰州大学、兰州铁道学院，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调研进行得很顺利。

其中有一天的下午，我有机会去李秉德先生家里拜访。他很慈祥，饶有兴致地跟我讲：“陕西师大和西北师大都是祖国西北地区的知名师范院校，咱们两家一定要好好团结起来，一起为西北的教育发展作贡献。”顿时，这种使命感、责任感被传递下来。在之后的教育管理课上，每当讲到管理者的个人魅力和学术权威时，我都会讲我亲身经历的李先生的故事，特别是他的德高望重、平易近人的学术权威形象。许美德教授也是具有这些特质的加拿大学者，被誉为“中国教育发展的白求恩”。她热爱中国文化，精通中文，以研究和支持中国教育发展为己任。她的中文能力在异文化沟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我自己在这个月的西北五省考察中受益匪浅，学到了许多。

2. 共同的目标与多国教学合作研究

在中加合作 4 年后，有两所美国大学的学者团队主动参与这个合作研究项目，他们介绍了美国的外语浸入式教学，并选派美国教育专业实习生来我国实验学校进行实习教学，英语浸入式教育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加美教育合作项目（CCUEI），我参与这个项目有以下三点体会。

第一，学者们在共同参与的教研活动中收获成长。英语浸入式教学和课程研究课题组的教研与我国教研部门的常规教研有两点不同：一是由大学研究者来统筹引领；二是具有国际合作性质，多国专家积极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CCUEI 项目的英语浸入式教研活动充分体现了改革的本土力量，也充分反映了国际合作的跨文化价值和学术影响力。大学研究者的教研动力来自好奇心、儿童英语发展的水平和速度、对专业发展及教学工作的促进、发自内心的喜欢和认可。西安外国语大学教研骨干樊教授说：“刚加入课题组时也不太懂，觉得新鲜好奇。我欣赏浸入式，就让儿子在浸入式小学和中学读书，他一路英语学习没有费什么劲。做这个课题自己一直很高兴，也在成长。我在大学开的是‘中小学英语教学法’的课，在课上介绍了浸入式，用了浸入式教学案例，去浸入式学校听评课是接触实践的机会。”

国际专家积极参与教学观摩与教研，长期参与的国际专家来自加拿大、美国 and 英国等几个英语国家。他们来到我国，直接到课堂听课，与孩子和教师互动。美国的 Trube 教授每次听课，实验教师都会留十分钟让她与儿童互动，孩子们表现出色，感到学的英语真的用上了。国际专家也在参与教研活动中受益。Siegel 教授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中国汉族儿童英语浸入式教学研究。Trube 教授每次到中国来都风尘仆仆地带着英语浸入式教学改革的任务和资料。她评教授职称时，在“为社会服务”一栏填写的是“参与中国英语浸入式教学改革的培训和教师指导”。因此，她的职称评审资料由美国大学快递到我方专家手中，我们课题组给美国方面递交了鉴定意见，作了积极推荐。

第二，多国合作的教研活动推动科研进步。英语浸入式教研吸引了研究生的参与，有几十名硕士生撰写了浸入式教学研究硕士论文。一些国内外博士生在实验校采集相关定性定量数据，亲身实践协助授课，甚至进行长期的田野研究。我国博士生论文选题有浸入式教师个体成长的轨迹研究、浸入式教师校内群体学习共同体模型的建构研究、活动对浸入式学生语言的介入作用研究、浸入式教学的话语策略支架研究、浸入式教学的整体性表现性评价研究等。在国际博士生中，艾伦·奈尔（Ellen Knell）完成了《中国西安早期英语浸入式教学与读写素养的纵向研究》。该论文是奈尔博士顺利获得美国犹他州教育厅前任汉语浸入式教育官员职务的关键因素。奈尔是 Siegel 教授的博士生，经 Siegel 教授推荐参与了这个合作项目。

日本早稻田大学新保墩子教授是中日教育友好使者，20 世纪 80 年代初，她在北师大教育系与中国学生一起学习，共同活动，中文就是这样学会的，她认为自己就是中文浸入式教育的例子。近年来，她主持了一项日本国家课题“中国小学英语教育研究”，带领几名日本语言研究学者到西安、广州和云南，参观了解语言浸入式教育。这些日本同行赴英语浸入式小学实地考察听课多次，与 CCUEI 课题组研究者座谈，并邀请 CCUEI 研究者和教师到日本交流英语教育方面的经验。

第三，多国教育合作项目共同关注并参与国际中文教育。我们课题组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国际中文教育在国外的的发展。在北美，汉语作为外语的浸入式教学始于 2009 年的美国犹他州，我们与美国犹他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和西安外国语大学迟延萍教授访问那里时，接待我们的州教育厅汉语浸入式教育官员、中小学学校校长和师生，以及大学教授们，个个都说的是中文。我很惊讶，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犹他州学习汉语人数占全美总数的五分之一。目前共有 76 所中小学开展该项目。卡斯卡德小学是犹他州一所公立学校，成立于 1967 年，是州内最早开展中文浸入式项目的学校之一，全校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参加了该项目。

本人作为 CCUEI 这个多国合作项目的代表，目前正在帮助策划在加拿大密西沙加市杜威学院成立中文学校，面向华人华侨子女和外国儿童进行中文浸入式教育。我们的多国合作研究，不仅语种扩大了，而且具有反哺作用。顺便提及，海外华人华侨研究者、管理者及教师在合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桥梁作用，他们通晓中文、英文，熟悉中国及所在国的国情和文化，基本不需要在沟通上的磨合，不但知晓，而且能够满足我们的教育与专业需求。

语言浸入式教学与课程研究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合作非常关键。浸入式项目从无到有、不断茁壮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外专家的引领和帮助，无论是项目规划，浸入式模式的借鉴和适应，教材开发和师资培养，还是各种学术活动的组织等。我本人是这个多国合作项目的协调人和中方负责人，深深体会到，这个合作项目真正发挥了“合作、互利、共赢”的作用。我们感悟到，国际教育合作要立足本国的社会背景和教育需求，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在合作中相互借鉴，共同改革教育实践。

四、结束语

回顾往事，从不愿意当教师到一辈子从教，从不擅长外语到从事语言教育研究将近 30 年，从喜欢理科到从事文科研究 45 年，能从不愿意、不擅长、不喜欢中走出来，带着使命，克服重重困难，勇往直前，坚持、热爱、执着追逐自己的好奇心，为教育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这使我想到了顾明远先生在 2020 年北师大教育学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四句话：“像松树一样做人，坚挺不拔；像小草一样学习，随处生根；像大海那样待人，容纳百川；像细雨那样做事，润物无声。”

我也深深体会到，作为大学老师，要明确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创造知识的场所，所以高校教学和指导学生一定要将授课与科研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将传授间接经验与教师的直接经验相结合，这样能起到教学相长的作用，促进学生思考、创新、人格成长。

回顾往事，可谓硕果满满。但是，我时刻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躺在回忆中沾沾自喜。面临教育数字化和时代的新变革，我自忖面对的未知大于已知。我虽然年过七旬，还必须继续学习、勤于学习、乐于学习，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已不是什么时髦的事、不是奢侈品，而是人人的刚需啊！

（责任编辑 曹周天）